

DOI:10.12405/j.issn.2097-1486.2024.03.006

不同层次高校青年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研究 ——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的追踪分析

王维懿

江南大学研究生院, 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 本文追踪分析了学术起点相近但就职于不同层次高校的青年学者, 通过比较其获青年基金之后十年的学术发展轨迹与差异, 探讨重点建设政策与高校层次差异对学者长期学术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 重点建设政策在改善高校科研条件和提升人才稳定性方面成效显著, 就职于重点建设高校的学者在学术发展上呈现出明显优势。然而, 该政策也加剧了高校间的资源不平衡。高竞争项目越来越集中于重点建设高校, 非重点建设高校学者获资助的可能性显著降低。面上项目资助数的增长更明显地惠及重点建设高校学者, 而一般院校学者的获资助数未有显著改善。非核心重点建设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与一般院校学者差异不显著, 表明资源分配的层次结构削弱了政策的广泛覆盖效果。总而言之, 学术资源与科研环境的差异随时间推移放大了不同层次高校间的学者学术发展差距。这一结果突显了资源分配不均对学者学术发展的长期影响, 为未来政策设计和资源优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关键词: 基础研究; 青年学者; 学术发展; 高校

中图分类号: G6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7-1486(2024)03-0287-08

Academic Development Disparities among Young Scholars at Different University Tier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Youth Fund of NSFC

WANG Weiyi

Graduate School,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racks and analyzes young scholars in different university tiers with comparable academic starting point by comparing the academic trajectories and disparities over a decade after their receipt of the Youth Fund of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SFC). The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key construction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hierarchies on the long-term academic development of these scholar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key construction policies in universities have effectively improved research conditions and enhanced talent retention, with scholars at key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s exhibiting significant advantages in academic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policies have also intensified resource disparities across institutions. High-competition funding is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in key construction universities, significantly limiting the opportunities for scholars at non-key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s. The growth in general program funding has predominantly benefited scholars at key construction universities, with little improvement for those in general institutions. Moreover, scholars at non-core key construction universities show no significant academic development advantage over those at general institutions, suggesting that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constrains a broader reach of the policy benefits. Overall, disparities in academic resources and research environments have progressively widened the development gap among scholars of different institutional tiers. These results underline the enduring impact of resource inequities on scholars' academic trajectories, meanwhile providing important references for the design of equitable and effective policy framework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basic research; young scholars; academic development; universities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2019SJZDA073)

收稿日期: 2024-07-10; 修回日期: 2024-08-03

0 引言

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是基础研究的核心任务之一,通过基础研究的科研实践,不仅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还有助于提升学者自身的研究能力,以及协调和管理的水平等。在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更加侧重人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重要战略定位。目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人才的发现和培养方面已经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资助体系^[1]。根据科研人员的年龄阶段,形成了“后备人才—青年人才—优秀青年—杰出青年”的人才资助链;为推进学术领军人才的成长和创新团队的培育,设立了以国内优秀科学家为学术带头人、中青年科学家为骨干的创新研究群体项目;为扶持边远及欠发达地区的科研人员,设立了地区基金;为充分发挥海外及港澳资源优势,设立了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支持海外及港澳华人学者与国内科研人员开展高水平合作研究。这一体系化的资助政策为建设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科技队伍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也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对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具有深远影响。建国初期,为应对财政资源匮乏的挑战,我国确立了重点大学政策,通过行政手段和制度倾斜,在师资调配、招生分配等方面优先支持重点高校建设^[2]。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政府大幅提高了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启动了“211工程”“985工程”等一系列重点建设项目^[3]。这些政策极大地改善了重点高校的办学条件和科研环境,但同时也使得不同层次高校在资源配置、办学条件以及发展水平上出现了显著差距^[4]。这种差距不仅深刻影响了高校整体的发展,也对学者个体的长期学术成长带来了显著的影响。身处不同层次高校的青年学者,其学术发展轨迹在重点建设政策等的推动下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

本文以青年学者基础研究能力的发展为切入点,评估不同层次高校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的学者在其后数十年的学术发展轨迹,探讨重点建设政策与高校层次差异对学者长期学术发展的影响。研究重点分析学者在获得青年基金资助

后,是否进一步获得其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特别是杰出青年基金等高竞争项目¹⁾的支持,以及其后续研究项目总量的变化。通过比较学术起点接近但就职于不同层次高校的学者在长期学术发展中的差异,揭示重点建设政策对学者学术成长的深远影响。

1 研究设计

1.1 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及学术发展指标量化

1.1.1 样本选择依据

本研究以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金资助的学者作为研究样本,主要基于以下考虑:青年基金主要资助不超过35周岁、有志于从事基础研究的青年学者。因而,获得该类基金的资助通常是学者早期学术生涯的一个重要节点。由于青年基金采用统一的评审标准和规则,可以认为来自不同层次高校的获资助学者在学术能力和水平上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从而有效控制了样本的学术起点,减少学者因个体差异导致的估计偏差。通过比较这些学者在后续研究中参与高竞争项目及其他研究项目的数量,能够反映不同层次高校学者在资源竞争与获取上的差异,有助于进一步分析重点建设政策对于学者学术成长的影响。

本研究对样本学者进行了为期十年左右的跟踪,研究他们在获得青年基金资助后的学术发展轨迹。这一时间跨度的设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学术成长具有显著的累积效应,政策与资源对学术发展的影响通常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短期数据可能受到随机因素干扰,难以准确捕捉政策效果。通过长期观察学者在高竞争项目和研究项目总量上的变化,能够更好地揭示高校层次与政策对于学者学术成长的深远影响。

1.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年度资助项目统计,以及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Science Fund Online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ISIS系统)提供的综合信息查询服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年度统计数据:提供了青年基金资助项目的总体情况,包括资助学科、资助金额及申请成功率等,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性数据支持。ISIS系统,作为一个基于互联网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

1) 在本文中,高竞争项目包括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以及研究计划和联合基金的重点项目等。

与信息发布平台,ISIS系统提供了详尽的项目信息,包括申请人基本情况、项目资助类型及后续研究成果等。该系统的数据全面性和准确性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可靠保障。

基于以上数据来源,本文得以全面追踪样本学者的学术发展轨迹,并分析不同层次高校学者在高竞争项目资助率和研究项目总量上的差异。

1.1.3 学术发展的指标与量化

本文将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具体化为其后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情况,并进一步将个体层面的数据汇总到高校层面,得到高校学者在一定时期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的平均水平。为确保分析的可操作性,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学者的学术发展进行衡量:1)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杰青项目)的比率,它反映学者在高水平项目竞争中的成功率,作为衡量学术竞争力的重要指标。2)高竞争项目的比率,包括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创新研究群体、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以及研究计划和联合基金的重点类项目,它综合衡量学者参与高竞争科研项目的广度和深度。3)研究项目的总量,以学者自获得青年基金资助后的11年内所获项目总数为基础,包括重点项目和面上项目。为便于统一比较,本文将1个重点项目折合为2个面上项目,并以折合面上项目数作为研究项目总量的衡量标准。

通过以上三个维度的界定,本文旨在较为全面地反映学者在长期学术发展中的资源获取情况和学术发展情况,为探讨高校层次与政策效应提供一定

的量化依据。

1.2 研究样本的分组与分布

1.2.1 基于重点建设政策的高校分组

重点建设是我国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举措,其政策演变对高校资源分布和发展模式长生了深远影响。在建国初期,由于财政困难,国家主要依靠政策与行政等手段对重点大学予以倾斜支持,比如在师资调配、人员编制、基本建设、专业设置、招生分配等方面优先保障重点建设高校的发展。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期,财政收支日渐宽裕,对高等院校的重点建设有了较为实质性的投入,在1978年确立了88所重点大学、1984年启动了“重中之重”高校建设等^[5]。进入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中央政府财政能力大幅提升。在此背景下,政府启动了一系列以提升高校科学研究能力为核心的重点建设项目,包括1995年启动“211工程”、1999年启动“985工程”等^[6]。

由于在不同历史时期,重点大学政策不尽相同,受政策变动影响,不同高校的地位也有变化:一些高校持续得到重点建设,一些高校早期不是重点大学,后来被列入重点大学,还有一些高校曾经是重点大学,后来又不再被列入重点大学。而本节拟通过比较就职于不同层次高校的学者在其后数十年的学术发展差异,探讨不同层次高校在办学条件、经费开支甚至发展水平上产生较大差距对于身处其中学者的学术发展产生的影响。故而,本文梳理了不同时期高校层次与地位的变动情况,并基于重点建设政策将高校划分为以下六组,如表1所示。¹⁾

表1 基于重点建设政策的高校分组

Table 1 University Grouping Based on Key Construction Policies

高校分组	高校层次与地位变动
高校①	早期为1984重中之重高校,后期为“985工程”高校。有14所高校,包括7所C9高校 ¹⁾ (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7所非C9高校(如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
高校②	早期为1978年恢复的88所重点大学,后期成为“985工程”高校。有25所高校,包括2所C9高校(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23所非C9高校(如湖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
高校③	早期为1978年恢复的88所重点大学,后期成为“211工程”高校(如东北大学、郑州大学等)。有34所高校。
高校④	早期未被列入1978年恢复的88所重点大学,后期成为“211工程”高校(如苏州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有39所高校。
高校⑤	早期为1978年恢复的88所重点大学,后来未被列入“211工程”高校。有15所高校。
高校⑥	早期、后期均未被列入重点建设的一般院校。

1) 考虑到“985工程”首批重点建设的9所高校获得了远多于其他“985工程”高校的经费投入,本文将其与其他“985工程”高校进行了区分,为了叙述上的简洁,本文以C9指代首批9所“985工程”高校。

这些分组展示了重点建设政策的演变对高校层次与地位的显著影响,从早期重点政策的有限覆盖,到后期政策对部分高校资源倾斜的扩展。图1进一

步通过可视化的方式展示了不同高校层次和地位在不同时期的圈层结构变化,使政策演变对高校分层的影响更加直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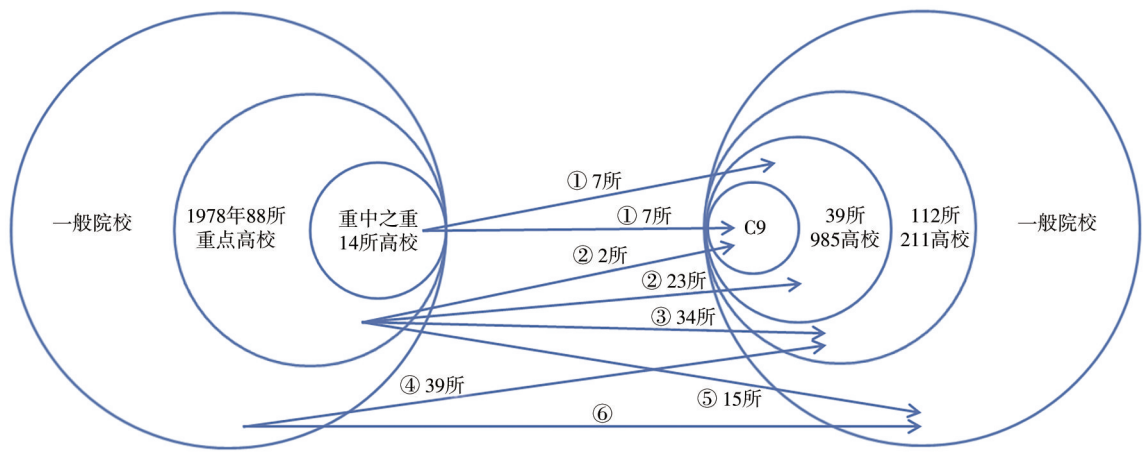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时期重点大学地位变动示意图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Changes in University Status Across Different Periods of Key Construction Policies

1.2.2 两批样本的选取与分布情况

为探究不同时期重点建设政策对学者学术发展的影响,本文选取了1987—1991年和2000—2002年两个时段获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的学者样本,对其未来十年的学术发展差异进行比较分析。

1987—1991年获得青年基金资助的学者,其学术发展主要反映了早期重点大学政策的影响。选择1987年作为样本起始年的原因在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于1986年设立,青年基金项目首次设立于1987年。选择了5年的样本数据,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确保有足够多的有效样本;二是,尽量减少后期重点大学政策对样本数据的干扰,从而更清晰地分析早期的政策效应。

2000—2002年获得青年基金资助的学者,其学术发展则主要体现了后期重点大学政策的影响。由于“985工程”于1999年启动,故而以2000年作为样本起始点。同时,考虑到青年基金资助数量在此期间有显著增长,本文选择了3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范围。以学者获得2002年的青年基金为例,衡量学者学术发展的指标之一为自获得青年基金资助后的数十年内获得的研究项目数,即指从2003到2013年获得的研究项目数。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研究发现部分学者在获得青年基金资助后未有后续科研活动记录,也未能在公开渠道中找到其学术机构任职信息。这些学者被归类为“非活跃学者”。尽管非活跃学者样本未纳入后续的分析,但其分布情况为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

和人才流失现象提供了重要参考。

研究样本即活跃学者与非活跃学者的具体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从研究样本的总体变化来看,第二期样本(2000—2002年)的学者数量(512人)远高于第一期(1987—1991年)的样本数量(132人),反映了青年基金资助规模的显著增长。

表2 研究样本与非活跃学者样本的分布情况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Samples and Inactive Scholars

高校类型	研究样本(644)		非活跃学者样本(199)	
	1987—1991年	2000—2002年	1987—1991年	2000—2002年
高校①	35	175	55	14
高校②	66	208	69	13
高校③	13	43	23	5
高校④	6	34	4	2
高校⑤	1	7	3	0
高校⑥	11	45	6	5
总计	132	512	160	39

从非活跃学者的比例变化来看,第一期样本中非活跃学者比例较高,超过50%,特别是在高校①、高校②和高校③中,非活跃学者数量接近或超过研究样本数量,反映出该时期国内高校科研条件有限、人才流失严重的问题。相比之下,第二期样本中非活跃学者的比例显著下降,仅为7.1%。重点建设高校(如高校①和②)的非活跃学者比例大幅降低,表明重点建设政策在改善高校科研条件、提升人才

稳定性方面成效显著。

从活跃学者在不同层次高校的分布来看,高校①和高校②(重点建设高校)的活跃学者在两期研究样本中的占比最高,这表明重点建设政策对优质资源配置的倾斜具有持续性。同时,这两类高校在第二期样本中的非活跃学者比例显著下降,进一步体现了重点建设高校在吸引和留住科研人才方面的优势。

一般院校(高校⑤和高校⑥)的情况则是另一番景象,这两类高校在两期样本中的学者数量相对较少,且非活跃学者比例变化不大,表明一般院校在资源吸引力和人才流动性方面的改善较为有限。

2 早期重点大学政策下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分析

在考察早期重点大学政策与学者学术发展差异

时,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比较重中之重高校、非重中之重之重的重点大学以及一般院校之间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二是,比较后期为同类高校,而早期不是同类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这种差异体现了早期重点大学政策的影响。

基于第一期样本(1987—1991年),本文对重中之重高校、非重中之重之重的重点大学以及一般院校之间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进行了统计分析,基本结果如表3所示。在获得杰青项目、高竞争项目的比率上,从高到低依次为:重中之重高校、非重中之重之重的重点大学以及一般院校。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在杰青项目上,不同层次高校学者的获得比率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高竞争项目上,不同层次高校学者的获得比率上存在显著差异($P=0.039$)。T检验结果表明,自获得青年基金后数十年内获得其他研究项目的总数,不同层次高校学者间没有显著差异。

表3 早期重点大学政策下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

Table 3 Academic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of Scholars under Early Key University Policies

		获得杰青项目		获得高竞争项目		自获得青年基金后数十年内获得面上类项目折合数	
		是	否	是	否		
重中之重高校 14 所	计数	12	19	20	11	均值	1.65
	比例	38.70%	61.30%	64.5%	35.5%	标准差	[1.52]
非重中之重之重的重点大学 74 所	计数	20	64	36	48	均值	1.35
	比例	23.80%	76.20%	42.9%	57.1%	标准差	[1.22]
一般院校	计数	3	14	5	12	均值	1.12
	比例	17.60%	82.40%	29.4%	70.6%	标准差	[1.05]
合计	计数	35	97	61	71	均值	1.39
	比例	26.50%	73.50%	46.2%	53.8%	标准差	[1.28]

本文还对后期为同类高校,而早期不是同类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进行了比较:

高校③与高校④,两类高校在前期分别为非重中之重之重的重点大学和一般院校,后期皆为非“985工程”的“211工程”高校。对这两类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比较中发现:在早期,两类高校无论是在杰青项目、高竞争项目的比率以及自获得青年基金资助后的数十年内,获得的研究项目数均无显著差异;但在后期,两类高校的学者在获得青年基金资助后的数十年内,获得研究项目的均值均产生显著性差异($P=0.0490$)。两类高校学者在后期学术发展的显著性差异表明,早期重点大学政策为高校后期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

高校①中的C9高校(7所)与高校②中的C9高校(2所),两类高校在前期分别为重中之重高校与其他全国重点大学,在后期皆为C9的“985工程”高

校。对这两类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比较发现:只有在早期,两类高校学者在获得高竞争项目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前者获得高竞争项目的比率显著高于后者($P=0.018$),其他均无显著差异。也就是说,较之于1978年确立的其他重点大学,1984年重中之重高校政策对于不同高校的学者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高校⑤与高校⑥,两类高校在前期分别为非重中之重之重的重点大学和一般院校,后期皆为一般院校;高校①中的非C9高校(7所)与高校②中的非C9高校(23所),两类高校在前期分别为重中之重高校与非重中之重之重的重点大学,在后期皆为非C9的“985工程”高校。分别对着两组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进行比较,结果发现:无论早期或是后期,两类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均无显著性差异。前一组比较结果表明,一些高校虽被列入重点建设范围,但并非该圈层

的核心重点建设高校,较之于一般院校,得到的政策优惠相对有限,故而,两类高校学者在后期的学术发展中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后一组比较结果表明,一些高校虽被列入某个圈层重点大学,但并非该圈层的核心重点建设高校,较之于下一个圈层的重点建设高校,得到的政策优惠也相对有限,故而,两类高校学者在后期的学术发展中并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3 后期重点大学政策下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分析

在考察后期重点大学政策与学者学术发展差异时,也将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比较 C9 高校、其他“985 工程”高校、非“985 工程”的“211 工程”高校以及一般院校之间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二是,比较早

期为同类高校,而后期不是同类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后期重点大学政策的影响。

基于第二期样本(2000—2002 年),本文对 C9 高校、其他“985 工程”高校、非“985 工程”的“211 工程”高校以及一般院校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在获得杰青项目、高竞争项目的比率上,从高到低依次为 C9 高校、其他“985 工程”高校、非“985 工程”的“211 工程”高校以及一般院校。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在杰青项目上,不同高校学者的获得比率上存在显著差异($P=0.022$),在高竞争项目上,不同层次高校学者的获得比率并不存在显著差异。T 检验结果表明,自获得青年基金后数十年内获得其他研究项目的总数,不同层次高校学者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04$)。

表 4 后期重点大学政策下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

Table 4 Academic Development Differences of Scholars under Later Key University Policies

		获得杰青项目		获得高竞争项目		自获得青年基金后数十年内获得面上类项目折合数	
		是	否	是	否		
C9 高校	计数	30	152	37	145	均值	2.35
	比例	16.50%	83.50%	20.30%	79.70%	标准差	[1.50]
其他“985 工程”高校	计数	21	180	31	170	均值	1.85
	比例	10.40%	89.60%	15.40%	84.60%	标准差	[1.56]
非“985 工程”的“211 工程”高校	计数	5	72	11	66	均值	1.92
	比例	6.50%	93.50%	14.30%	85.70%	标准差	[1.51]
一般院校	计数	2	50	4	48	均值	1.46
	比例	3.80%	96.20%	7.70%	92.30%	标准差	[1.36]
合计	计数	58	454	83	429	均值	2.00
	比例	11.30%	88.70%	16.20%	83.80%	标准差	[1.54]

本文还对早期为同类高校,而后期不是同类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差异进行了比较。

高校③与高校⑥,两类高校在前期分别为非重中之重重点大学 and 一般院校,在后期分别为“211 工程”高校和一般院校。对这两类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比较发现:在早期,两类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并无显著性差异,但在后期,两类高校学者自获得青年基金资助后的数十年内,获得其他研究项目的总数产生了显著性差异($Pr(T>t)=0.0128$),前者显著大于后者。这表明早期 88 所重点大学政策与后期 211 政策间的交互效应对于相关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具有显著影响效应。

高校④与高校⑥,两类高校在前期皆为一般院校,在后期分别为非“985 工程”的“211 工程”高校和一般院校,高校③与高校⑤两类高校在前期皆为非

重中之重的重点大学,在后期分别为非“985 工程”的“211 工程”高校和一般院校。本文分别对这两组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这两组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均无显著性差异。这表明,一些高校虽被列入重点建设范围,但并非该圈层的核心重点建设高校,较之于一般院校,得到的政策优惠相对有限,故而,两类高校学者在后期的学术发展中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

高校②中的 23 所非 C9 高校与高校③,两类高校在前期皆为非重中之重重点大学,后期分别为非 C9 的“985 工程”高校和非“985 工程”的“211 工程”高校。在早期,两类高校学者自获得青年基金资助后的数十年内,获得其他研究项目的总数存在显著性差异($Pr(T>t)=0.0364$),前者显著大于后者,但在后期两类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并无显著性

差异。也就是说,较之于其他一些“211工程”高校的学者,就职于非核心重点建设的985工程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并没有显著差异。

高校①中的C9高校(7所)与高校①中的非C9高校(7所),两类高校在前期皆为重中之重高校,后期分别为C9高校和其他“985工程”高校。在早期,两类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并无显著性差异,但在后期,两类高校学者自获得青年基金资助后的数十年内,获得其他研究项目的总数产生了显著性差异($Pr(T>t)=0.0008$),前者显著大于后者。这表明,是否被列入“985工程”核心建设,对于学者的学术发展有显著影响效应。

从总体的趋势变化看,在杰出青年项目上,由于资助数多年来一直保持稳定,每年的资助项数稳定在200项左右,而学者、科研人员队伍却在不断扩容,因而,较之早期,对杰出青年项目的竞争十分激烈。通过对比表3、表4中不同层次高校学者获得杰青项目的比率变化,可以发现:获得杰出青年项目资助的学者,其所在高校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重点高校,对于其他大多数高校学者而言,获得这类项目资助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在高竞争项目上,其数量与经费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的增加也在不断增加,但高竞争项目数量的增幅远低于学者、科研队伍规模的增长,因而,较之早期,对于高竞争项目的竞争也变得更加激烈了。通过对比表3、表4中不同层次高校学者获得高竞争项目的比率变化,可以发现:获得高竞争项目的学者也趋向于向重点建设高校集中,对于其他大多数高校学者而言,获得这类项目资助的可能性较低。我们还发现,较之早期,其他重点高校学者获高竞争项目资助的比率在显著下降,而高校③却没有这种显著性下降。这表明,早期88所重点大学政策与后期211政策间的交互效应构筑了高校③的良好发展基础,在获得高竞争性项目上,该类高校学者的学术发展依然保持良好的竞争力;获得高竞争项目资助的学者,其所在高校逐渐集中于少数重点高校,尤其是前后两期均获得重点建设的高校;对于其他大多数高校学者而言,获得这类项目资助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低。

面上项目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数最多的项目类型,随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的快速增长,面上项目的资助项数与经费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本文对表1中六组高校学者在获得面上项目数进行了前后期比较,结果发现:较之早期,在获得青年基金

后的数十年内获得的面上项目上,高校①、高校②、高校③、高校④学者承担的面上项目数有显著增加;而高校⑤及其他一般院校学者则没有这种显著性差异。这表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经费增长中,后期得到重点建设高校的学者最为受益。

4 主要发现与讨论

本文评估了青年学者基础研究能力的发展状况,通过比较最初起点接近且就职于不同层次高校的学者,在其后十多年的学术发展差距,探讨不同层次高校在办学条件、经费开支甚至发展水平上产生较大差距对于身处其中学者的学术发展产生的深远影响。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重点建设高校在学术发展中优势显著。学者就职于前后两期均获得重点建设高校,如高校①、②、③,在学术发展方面展现出较为显著的优势。首批9所“985工程”高校学者,在获得青年基金资助后的数十年内获得的研究项目总数显著多于其他高校学者。这表明,持续的重点建设政策能够为学者提供更优越的资源 and 环境支持,长期促进学术发展。

第二,非核心重点建设高校的资源支持相对不足。部分高校虽被列入某个圈层的重点大学,但并非所在圈层的核心重点建设高校,其获得的政策支持较为有限。这些高校学者的后期学术发展中与一般院校的学者无显著差异,反映出资源分配的层级化可能削弱了政策覆盖的广度。

第三,高竞争项目的资助呈现集中化趋势。虽然近年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有快速增长,但高竞争项目资助数量的增加远低于学者、科研队伍规模的增长,因而,较之早期,对于这些项目的竞争变得更为激烈。获得杰青等高竞争项目资助的学者,越来越集中于少数重点高校,尤其是前后两期均获得重点建设的高校。对于一般高校和非核心重点建设高校的学者而言,获得此类项目的可能性显著降低。

第四,面上项目的资助增长更显著地惠及重点建设高校。面上项目的资助项数与经费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投入的快速增长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但本文发现,那些在20世纪90年代后被列入重点建设高校的学者自获得青年基金后数十年内获得的面上项目数有显著增长,而在其他一般院校学者的获资助数并未显著提升。这种资源分配的不均衡进一步拉大了高校间的学术发展差距。

第五,学术发展的长期积累效应。学术资源与科研环境的差异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放大了高校间的

学术差距。最初起点大致接近的学者,经过十年多的发展,由于身处不同层次的高校,其学术发展的差距也日益显现。即便在面上项目上,不同层次高校学者之间的差距正逐渐拉开,在杰青以及其他高竞争项目上,非重点建设高校学者获得的可能性越来越低。这表明,高校间的层级差距不仅影响当前资源获取,还对学者未来的成长轨迹具有深远作用。

本研究揭示了重点建设政策在推动高校发展和优化资源配置中的成效,同时也凸显了政策加剧高校间资源与学术发展不平衡的潜在问题。为此,未来的政策设计应注重资源分配的公平性与协同性。政策制定者可在资源分配中引入动态调整机制,探索更灵活的资源共享模式,加强重点建设高校与一般院校之间的合作。高校管理者应优化内部资源配置,通过集中优势资源,实现资源效益的最大化,助力学者在激烈的学术竞争中脱颖而出。青年学者应结合自身研究兴趣和职业规划,主动参与多样化的科研项目和学术合作,突破资源限制,寻求跨机构或

国际合作以提升竞争力。通过政策与个体的共同努力,未来的科研生态将更具包容性与活力,为更多青年学者创造公平的学术发展机会,同时促进高校之间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中国基础研究发展报告 2001—2010[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 [2] 胡炳仙.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重点大学政策及其影响[J]. 高等教育研究,2012,05:90-95.
- [3] “211工程”部际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211工程”发展报告[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9.
- [4] 陆文聪,陈赞. 教育资源不均等对收入差异影响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2007,5(6):51-57. DOI:10.13397/j.cnki.fef.2007.06.018.
- [5] 国务院. 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Z]. 国发[1978]27号.
- [6] 张国兵. 高等教育重点建设政策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王维懿,博士,副研究员。担任江苏省科学学与科研管理研究会常务理事。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等。Email: wwy@jiangnan.edu.cn

(责任编辑:云 洋)